

為蓋瑞遜翻案

孫同勛

Means and Ends in American Abolitionism: Garrison and His Critics on Strategy and Tactics, 1834-1850. By Aileen S. Kradit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67.

崛起於一八三〇時代的立即解放奴隸運動，一般說來得不到後世史學家的同情，特別是蓋瑞遜（William Lloyd Garrison）與其支持者。內戰史的修正史學家如藍道爾（James Randall）、克拉溫（Avery Craven）等人，都認為立即解放奴隸運動者是一羣不負責任的盲目煽動份子，是引發內戰的罪魁禍首。有的歷史學家如吳爾夫（Hazel Catherine Wolf）則指出「烈士心理」（martyr complex）驅使立即解放奴隸運動者故意的去激發衆怒。艾爾肯（Stanley Elkins）覺得強烈的犯罪感與個人主義使立即解放奴隸運動者不能採用切合實切的具體辦法來對付奴隸制度。在這些人的作品中，蓋瑞遜是主要的攻擊對像。這原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在當時蓋瑞遜被公認為是立即解放運動的領袖。後世不滿立即解放運動的人自難免對蓋瑞遜大肆撻伐。但奇怪的是即是那些對立即廢奴運動具有好感的史學家如巴恩斯（Gilbert Barnes）與杜蒙德（Dwight Dumond）對蓋瑞遜的批評甚至更為嚴酷。前者認為蓋瑞遜的激烈言辭與不負責任的行為成為推行立即解放運動的最大障礙；後者則完全否認蓋瑞遜的存在。總而言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前的史學家中即使有同情立即解放運動的人，但却幾乎沒有一位對蓋瑞遜有好評。¹

¹ 此處所提數人僅是批評蓋瑞遜與立即解放運動的數位代表性的史學家。各人的主要作品如下：James Randall,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1937), pp. 100-107; Avery Craven,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New

致此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蓋瑞遜是一個激進份子，而幾乎所有的史學家都是自由份子或保守份子。他們對蓋瑞遜要澈底改造美國社會的主張自難接受。所以在具有激進思想的歷史學家出現之前，蓋瑞遜是無望獲解好評的。

但在一九六〇年代，隨着新左派史學的崛起，蓋瑞遜的畫像有由黑暗變為光明的趨勢。激進的新左派史學家既急於為美國史建立一激進的傳統，則歷史上的主要激進份子如蓋瑞遜者是不會被忽略的。因此在他們筆下，蓋瑞遜不但被重建為立即解放運動的領袖，而且也成為大力改造社會的鬪士。不過，新左派史學家對立即解放運動與蓋瑞遜的研究雖能糾前人之失，發前人之未發，但却不能避免感情用事，矯枉過正之失。克拉德特爾 (Aileen S. Kraditor) 的作品是少數沒有此種缺失的研究之一。²

在立即解放運動的手段與目標一書中，克拉德特爾發現美國反奴隸制度會 (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 的分裂並不像過去歷史學家所說那樣，是因為大部份立即解放運動者對蓋瑞遜個人或其無理言行不滿而造成的。其分裂的根本原因是立即解放運動者之間對此運動的最終目標及達成此一目標的手段有基本的歧見，而這種歧見則導源於不同的社會思想。起初時理論與行動上的差別並不存在，到一八三七年歧見才出現，到一八四〇年已不能協調，因而立即解放運動為之分裂，其後兩派就各走自己認為最有效的路子。

根據作者的意見，立即解放運動含有兩個不同的派別。其一是比較溫和的改革派，另一是比較激進的革命派，蓋瑞遜為後一派的領袖。這兩派都同意奴隸制度是一種罪惡，應予立即廢除。

York 1942), pp. 117-120; Hazel Catherine Wolf, *On Freedom's Altar: the Martyr Complex in the Abolition Movement* (Madison, Wisconsin, 1952); Stanley Elkins, *Slavery: A Proble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Chicago, 1959), pp. 157-193; Gilbert Barnes, *The Antislavery Impulse, 1830-1844* (New York, 1933); 與 Dwight Dumond, *Antislavery: the Crusade for Freedom in America* (Ann Arbor, 1961).

² 有關新左派史學的崛起背景及其特質請參考拙著「二十世紀的美國史學」，美國研究，第一期（民國六十年三月），頁19~24。

但是因爲兩派在社會思想上的不同，却使兩派在最終目標與達成目標的手段上意見不一致。以蓋瑞遜爲首的激進派認爲無論南北美國社會在根本上是不道德的，奴隸制度只不過是其最壞的一面，他們的最終目的是澈底改造美國的社會結構與意識型態。溫和的改革派則認爲至少北方社會在本質上是良好的，奴隸制度只不過是一小小的偏差。他們的目的是廢除奴隸制度以保全北方的基本社會與道德安排。這種理論上的差別反映於實際行動，每一派對正當的煽動方式各有不同的看法。蓋瑞遜派雖然並不反對立即解放運動者私人參加政治活動，但却主張煽動應以道德說服爲主。非蓋瑞遜派固然承認道德說服的重要，但却主張立即解放運動應以組織的方式參加政治活動。不僅在煽動的手段方面兩派意見相左，即在組織方面兩派的立場也不相同。蓋瑞遜集團認爲廢奴運動的組織應該「寬大」，即應兼容並蓄所有持有不同宗教、社會與政治觀點的人，只要他們擁護立即廢奴的原則即可。其反對派則認爲廢奴運動的組織應該「狹小」，即凡被允許參加組織的人，其宗教社會與政治觀點可以與廢奴制度沒有關係，但至少不至因這些意見而招來一般人對廢奴運動的不滿。換言之，即令他們完全贊成立即解放奴隸，但如其對其他問題的意見足以刺激一般人民時，即不應包容於廢奴運動的組織之中。這些意見上的差別迫使立即解放奴隸運動者非確定美國反奴隸制度會的性質不可。所以自一八三九年開始，溫和派即多方企圖整肅蓋瑞遜的激進派。但他們的努力失敗了，一八四〇年他們就正式脫離廢奴運動的組織，並別起爐灶，並組織政黨，正式參加政治活動。

但就此而論，我們還看不出作者對蓋瑞遜的偏愛，顯示她爲蓋瑞遜作翻案文章的是她一再強調蓋瑞遜思想的合乎邏輯。她並不否認蓋瑞遜的想法與作法前後有不同，但她却指出蓋瑞遜的發展有其邏輯上的一貫性，並不像其他敵視的歷史學家所說的那樣盲目與不合理。除此之外，她也暗示蓋瑞遜的道德攻擊正擊中奴隸制度的最弱點，而蓋瑞遜的批評者則自參加政治活動後因政治上的權宜而一再與現實妥協，結果最後連立即廢奴的基本原則都

放棄了。她並且一改過去歷史學家的解釋，認爲美國立即解放運動的分裂不是因爲蓋瑞遜企圖控制它而造成的，而是因爲反對的溫和派企圖整肅蓋瑞遜的激進派而引發的，因此造成分裂的責任在溫和派而不在蓋瑞遜。凡此皆足以說明作者的偏愛是在蓋瑞遜一邊的。事實上，在她的作品中我們不難發現蓋瑞遜及其同伙是一羣思想前後一貫，堅守立場，眼光遠大，合理幽默，與長於戰術運用的自由平等鬪士，這與傳統史家的解釋簡直有天淵之別。

支持作者此一翻案解釋的證據並不新奇，作者指出她所根據的材料都是大家熟知的材料，在其書末所附的參考書目中她所提的參考書也不過二十種左右，非常有限，但她的註釋却非常詳細與廣泛。單就此而論，這不失爲一本純學術性的深入研究。她所根據的材料雖不新奇，但她的解釋却能不落俗套，發人之未發。前此的歷史學家對立即解放運動的研究雖多，但從理論上的差異對此運動之分裂作系統的解釋這還是第一本。這本書的可貴處不僅在於爲蓋瑞遜辯誣，糾正以前歷史學家對蓋瑞遜的若干誤解與偏見，而且也在於作者以嚴謹的態度說明立即解放運動的分裂不是因爲個人因素，而是因爲理論之不同。

但是本書也非毫無缺點。首先值得討論的是作者過份注重抽象的理論，而忽略這些理論對立即解放運動所可能發生的不利影響，因而不免使讀者覺得蓋瑞遜完全是對的。其實指責蓋瑞遜的人並不是毫無理由，蓋瑞遜的完美主義與堅持婦女參加美國反奴隸制度會確實引起一般重視傳統的人們的廣泛不滿，因爲立即解放運動帶來不必要的困擾，使原本同情此一運動的人疏離，這是共知的事實，但作者却未加說明或解釋。其次立即解放運動的分裂理論上的差異固然重要，但私人間的恩怨也不無作用。蓋瑞遜的獨斷支配作風曾使很多最親密的朋友成爲仇敵，而對蓋瑞遜個人不滿的人在蓋瑞遜運動中都擔任重要角色。只注重理論上的差異，而不顧個人因素很難以使人覺得作者對立即解放運動的分裂的解釋是完全合理的，充其量她只不過說明其中的一個原因罷了。

。其三作者以一八五〇年爲其研究的結束日期，據她自己解釋說到一八五〇年整個立即解放運動的戰略戰術問題都已發展成型，其後的變化都不出這些定型。這一說法似乎不無問題。蓋瑞遜自己是一個非抵抗主義者（nonresistant），他不但反對任何暴力，甚至反對人類政府。他的支持者中有若干人如菲立普（Wendell Phillips）雖不像蓋瑞遜一樣也是非抵抗主義者，但也反對使用暴力來解放奴隸。他們甚至主張解散聯邦，南北和平分離，以求達到廢除奴隸制度的目的，可見他們是堅決的反對使用暴力的手段。但到內戰發生之後，他們不但不再提和平分離的主張，反而全力支持林肯以武力迫使南方重回聯邦的政策，希望戰敗的南方將被迫解放奴隸，這在蓋瑞遜或菲立普來說是他們思想與手段上的一極大的轉變。蓋瑞遜何以有此轉變？他是否已放棄了非抵抗主義？作者指出非抵抗主義是蓋瑞遜完美主義（perfectionism）的一部份，此一轉變是否表示蓋瑞遜已放棄完美主義？如答案爲否，則暴力主張又如何與其完美主義相合？如答案爲是，則蓋瑞遜的思想基礎又轉向何方？這些問題都顯示內戰發生時蓋瑞遜的思想與一八五〇年以前並不完全一致，但作者却認爲一八五〇前後蓋瑞遜的思想在基本上沒有改變，而沒有加以任何的說明，這不能不說是一大憾事。

雖然如此，如單就作者所討論的時期而言，她的客觀冷靜的態度，嚴謹的論證，詳盡的註解，以及對前人誤解偏見的糾正，使這本書不失爲討論立即解放運動的新左派作品中的佳構。